

WUJINGQISHU JIANSHANG

《武经七书》

鉴赏

《〈武经七书〉鉴赏》编委会

军事科学出版社

《武经七书》鉴赏

《〈武经七书〉鉴赏》编委会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经七书》鉴赏/《武经七书》鉴赏编委会
编著.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1

ISBN 7-80137-517-3

I. 武… II. 黄… III. 兵法-鉴赏-中国-古代
IV. E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036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电话:(010)628826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颐航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次: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22.125

印次: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613 千字

印数:1-3000 册

书号:ISBN 7-80137-517-3/E·316

定价:45 元

编委名单(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式金 孔德骐 任力
赵海军 黄朴民 萧大维
霍印章

特约编辑

王式金 任力 黄朴民

Mr 36/16 01

目 录

不朽的兵学圣典

- 《孙子》鉴赏…………… 赵海军(1)
- 一、战争的沃野,文化的春天…………… (2)
 - 《孙子》产生的历史背景
- 二、冲破迷雾见青天…………… (8)
 - 关于孙子其人其书
- 三、不朽的兵学圣典…………… (16)
 - 《孙子》兵学体系
- 四、历久而弥新——《孙子》的深远影响…………… (33)
- 《孙子》原文及译文…………… (41)

与孙子兵法媲美的兵典

- 《吴子》鉴赏…………… 王式金(73)
- 一、永不磨灭的兵学政治家…………… (73)
- 二、成书于战国前期的兵笈…………… (91)
- 三、闪烁时代光辉的军事思想…………… (104)
- 四、传之于后世的兵法经典…………… (118)
- 五、《吴子》各篇内容解读…………… (133)
- 《吴子》原文及译文…………… (150)

中国古军礼的丰碑

- 《司马法》鉴赏…………… 黄朴民(174)
- 一、“文能附众,武能威敌”…………… (174)
- 司马穰苴的生平事迹
- 二、“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 (183)
- 《司马法》的来龙去脉
- 三、“以礼为固,以仁为胜”…………… (189)
- 《司马法》军事思想揽胜
- 四、“所传兵家流,皆出《司马法》”…………… (204)
- 《司马法》的特色与地位
- 《司马法》原文及译文…………… (218)
- 附录:《司马法》佚文选辑…………… (239)

中国古军法的宝库

- 《尉繚子》鉴赏…………… 任力(251)
- 一、千古公案 众说纷纭
- 《尉繚子》的性质及作者…………… (251)
- 二、七雄并立 逐鹿中原
- 《尉繚子》的时代背景…………… (256)
- 三、杂取众家 独具特色
- 《尉繚子》主要军事思想评说…………… (259)
- 《尉繚子》原文及译文…………… (281)

先秦兵学集成之作

- 《六韬》鉴赏…………… 孔德骥(329)
- 一、托名之作 出于高人…………… (329)

二、成书战国 学界共识	(332)
三、兵家集成 内容宏富	(338)
四、文韬武略 惠远泽深	(348)
《六韬》原文及译文	(352)

大一统兵学的奠基者

——《黄石公三略》鉴赏

黄朴民(449)

一、云笼雾罩	(449)
--------------	-------

——《三略》的来龙去脉

二、兼容博采	(459)
--------------	-------

——《三略》的思想特色

三、安治天下	(472)
--------------	-------

——《三略》的时代精神

四、指陈成败	(478)
--------------	-------

——《三略》的兵学内涵

五、通道适用	(485)
--------------	-------

——《三略》的历史地位

《黄石公三略》原文及译文	(490)
--------------------	-------

附录:《黄石公素书》原文及译文	(510)
-----------------------	-------

别开生面的兵学宝典

——《李卫公问对》鉴赏

萧大维(523)

一、两位主人公其人其事	(525)
-------------------	-------

二、一场真伪之辩的是是非非	(538)
---------------------	-------

三、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系统小结,贵在创新	(546)
-----------------------------	-------

《李卫公问对》原文及译文	(566)
--------------------	-------

附录：

失落千年的兵苑奇珍

- 《孙臆兵法》鉴赏…………… 霍印章(625)
- 一、身残智杰 功垂青史…………… (627)
- 二、斗转星移 与时俱进…………… (639)
- 三、祖述孙武 承前启后…………… (643)
- 四、兵家亚圣 光照千秋…………… (660)
- 《孙臆兵法》原文及译文…………… (666)
- 附录：《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节录)…………… (694)

不朽的兵学圣典

——《孙子》鉴赏

《孙子》亦称《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有“百世兵经”的美誉，而且是享誉世界的军事名著，这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千百年来，《孙子》的校勘、注疏、阐释之作不断涌现，数量之多是其他任何兵书所无法企及的，然而要真正读懂《孙子》却殊非易事。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孙子兵法》毕竟是 2500 多年以前的产物，其所用文字、所涉及的历史文化背景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今人理解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二是《孙子》是从哲理的层面研究军事问题，《孙子》研究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成为一种文化积淀，如果离开了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则难以把握其脉络和实质。

有鉴于此，我们在这里不再局限于对《孙子》的文意解释，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来解读，以期帮助广大读者从一定深度和广度来透视《孙子》这一兵学名著，并进而得以踏入传统兵学的大门。

本文拟分四个部分，着重介绍《孙子》产生的历史背景、孙子其人其书、孙子兵学体系以及《孙子》一书的深远影响。文后，附有《孙子》原文及白话译文。

一、战争的沃野,文化的春天

——《孙子》产生的历史背景

任何理论著作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孙子》当然也不例外。《孙子》产生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末期。这一时期,一方面战争开始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军事领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学术下移和思想解放,文化领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从而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为《孙子》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秋末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演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其间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西周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礼乐文明,至此终于由逐渐式微而走向分崩离析。

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体现为军礼,其内容包括诸多方面:征伐大权掌握在最高统治者周天子手中,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军队的规模有严格的限制,依次为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至于无军;发动战争要“不加丧”(不在敌国国君等重要人物丧期发起进攻)、“不因凶”(不在敌国出现灾难时发起进攻);交战时要约时、约地而战,实施“偏战”(正面列阵作战)、“不鼓不成列”(不在敌人列阵完成前击鼓进攻);对待敌方要“不重伤”(不伤害负伤的敌军士卒)、“不擒二毛”(不俘捉头发花白的老人);战胜之后一般不能灭亡其国,而要讲求“兴灭国,继绝世”,如此等等。这一军礼制度虽在一定的时期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它从本质上扭曲了战争领域的自然规律,对兵学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它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历史陈述。

西周是军礼制度的鼎盛时期。从春秋开始,由于血缘宗亲关系

的淡化和周天子权威的下降,军礼制度逐渐走向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遭到破坏,各诸侯国为争夺霸权而相互征伐,大国争霸成为整个春秋时期战争的主要内容。在春秋近三百年中,凡见诸记载的大小战争竟达 480 余次,频繁程度可想而知。战争的内容则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

一是军队数量越来越多,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自春秋中期始,伴随着井田制的破坏,国、野之分渐趋泯灭,“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兵役征发原则遭到否定,大量“野人”被编入军队,使各诸侯国的军队数量激增,旧军礼对各诸侯国军队数量的限制已被彻底打破。晋楚城濮之战,仅晋军就出动兵车 700 乘之多。如此规模,在西周乃至春秋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孙子·作战篇》言称“十万之师”,说明至春秋末期,大国征战出兵 10 万已是相当普遍的事了。

二是军队的成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自商、周至于春秋初期,军队主要是指车兵而言,由战车上的甲士和从属于战车的徒兵组成。甲士一般由贵族充当,配备有精良的青铜兵器,是作战的主体力量;徒兵则由普通“国人”(平民)及少量奴隶充任,配置木石兵器,战斗力很弱。春秋中后期,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大量“庶人”获得了相对的人身自由,成为农奴。出于扩充实力的需要,大批农奴被编入军队,徒兵数量由此而激增。农奴具有较高的从事战争的积极性,再加上武器装备相对改善的因素,使徒兵的战斗力的有所增强,使之逐渐摆脱了对车兵的从属地位而再次成为独立的兵种,步兵重新崛起。由于步兵较之于车兵具有更强的机动性和地形适应性,至春秋末期,它已迅速发展起来,并呈现出一种取车兵主导地位而代之的趋势。与此同时,水兵也在南方吴楚地区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春秋末期的一个重要兵种。

三是作战方式的变化。春秋中期以前,由于车战占绝对主导地位,出于战车驰骋的需要,作战往往在平原旷野进行,以堂堂之阵实施正面会战,即所谓的“偏战”。后来,随着步兵战斗力的增强,更由

于其较之于车兵具有更强的机动性和地形适应性,作战方式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作战空间从平原旷野开始向外延伸,迂回、侧击、包抄、设伏、奇袭等新的作战样式纷纷登上战争舞台,要塞战、城池攻防战也初步进入了角色。

四是战争观念的更新。春秋以后,旧军礼渐趋式微。如果说齐桓公迁邢、封卫、救燕之举尚可为人们广泛称颂并有助于其实施霸业的话,宋襄公泓之战中“不鼓不成列”的做法则遭到司马子鱼等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并成为其图霸失败的重要原因,至于城濮之战晋文公“退避三舍”便完全出于战略的需要,所谓履行流亡楚国时的诺言完全是虚饰而已。及至春秋末期,出奇用诈已成为军事斗争中的常用手段。鸡父之战中的晦日出兵,笠泽之战中的示形突破,使诡诈之道在战争中叠放异彩。大量使用间谍,以惑敌误敌,更是对旧军礼制度的彻底否定。越国采取一系列韬晦之策,疲敌误敌,最终灭亡吴国便是明证。

战争领域出现的崭新气象,使得被旧军礼扭曲的军事规律得以恢复其本来的面目,从而为《孙子》这部理论巨著的产生奠定的坚实的实践基础。

和战争领域的深刻变化一样对《孙子兵法》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春秋末期文化的繁荣,其标志是朴素唯物论的萌动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发展。

西周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和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制约,文化乃是王室贵族的专利品,对于平民甚至普通贵族而言,是不具备从事独立学术研究的条件的,更不可能著书立说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一特定的文化格局,史称“学在官府”。

春秋以后,随着周天子权威的下降,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社会矛盾激化和权力斗争的结果,极大地调整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许多原来的贵族失去以往的特权,下降为小生产者。这一趋势在春秋中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些没落的贵族中,有许多是原

来从事文化教育的官吏。他们在失去贵族地位、沦为平民的同时,也将文化带到了民间,从而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文化领域的这一变化,史称“学术下移”。对此,孔子曾感慨地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春秋末期,民间学术活动空前活跃,私学勃然而兴。鲁国的孔子、郑国的邓析,都是著名的私学创立者。孔门之下,从学者竟有 3000 多人!这时,除了官修史籍政典外,私人著述也开始问世。“学术下移”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士”这个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分化,即由原先以武士为主体的士阶层中,分化出以著书授徒为主业的文士,而且渐渐成为士的主体构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出现并开始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的一些精英脱颖而出,成为诸子学术的先驱乃至创始人。春秋末期,儒、道两家勃然而兴,早期法家也相当活跃,其他尚未形成学派的,也各逞异说。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已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上古史中,神学思想曾长期占统治地位。中国的神学以卜筮为主要形式,其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即认为在自然之外,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神的力量,决定着世间的一切,天与人之间是相互感应的:上天通过种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将自己的意志垂示给人类;人们只要按上天的垂示去办,便可以趋吉避凶。形形色色的卜筮,便是沟通天与人之间的桥梁。

西周以前,卜筮活动非常盛行,通过卜筮进行决策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系因刻写在龟甲和牛骨之上而得名。迄今发现的殷商时期的卜龟、卜骨,便达 15 万余片之多。作为专司卜筮职业的“巫”,在上古统治集团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卜筮的盛行甚至很早便导致了卜筮理论著作的问世,《周礼》所谓的“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较之于其他著作的出现明显要早得多。

卜筮的产生和盛行,反映了先民们这样的相互矛盾的心理:一方

面是感到在自然面前十分渺小,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又在积极探求自然规律,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卜筮在走向鼎盛之时,也便孕育了自身的反动因素。这些思想一旦从神学的襁褓中脱离出来,便成为朴素唯物论思想的重要源泉。这一天在春秋末期终于来临了。

春秋末期,伴随着学术繁荣局面的出现,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天道”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老子着力于以自然之道代替神学中的天道,孔子则有“不语怪、力、乱、神”的说法,子产更明确地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著名论断,这些思想标志着人们开始由重天道向重人事、自然的转变。军事领域在反天道方面则走得更远。一次,楚国的公子心率军与齐军作战。时有彗星出现,柄(即慧尾)指向齐国的方向。按照卜筮的理论,柄指向的一方将获得胜利,因此有人建议公子心不要与齐人作战。公子心回答说:“彗星何知?以彗斗者,故倒而胜焉。”对神圣的卜筮理论采取了近乎嘲弄的态度。

春秋末期的反天道精神,对孙子无疑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可贵的是,他在这场反天道的斗争中,站在了时代的前列,体现出比较坚决的朴素唯物论精神。《孙子·用间篇》明确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在“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基础上,通过对敌我双方诸因素综合比较来预见战争胜负、进行战略决策的“庙算”理论,对朴素唯物论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与朴素唯物论思想产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长足进步。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对于“道”的内涵,先秦诸子虽各执一词,分别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给以不同的阐述,如老子的无为之道,孔子的中庸之道,但如果我们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表象,便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仍有其不变的特质。对此,《易经·系辞上》道出了真谛:“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整个世界的形成,便是阴阳

二性相互依存又相互渗透的结果。阴阳之道乃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核心内容。

阴本指物体背日而言,阳本指物体向日而言。经过哲学家的提炼,阴阳便从具体的物上升为具有一般意义且统率万物的哲学范畴,这一过程至晚在春秋末期已经完成。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这里的阴阳显然已具备了哲学层次的一般意义。任何事物都具有阴阳二性,也即处于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因此在春秋时期的典籍中便出现了许多对立统一的范畴,诸如刚柔、有无、明昧、利害、吉凶、成缺、雅俗、安危、动静、虚实、奇正、表里,等等。这一独特的范畴群,构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春秋时期的哲学家不仅认识到事物的阴阳二性,即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而且朴素地认识到事物总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周易》的“易”,最根本的含义便是变易、变化,正如《易传》所指出的那样:“《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春秋时期出现了许多关于事物运动变化的辉煌命题,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范蠡的“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史墨的“物生有两”、“社稷有常奉,君臣无常位”等。这些命题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都揭示出:矛盾对立面是相对的、相比较而存在的,并各自蕴涵着自己相反的因素;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转化、循环往复乃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规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子和范蠡。《老子》一书形成了历史上最早的、较完备的辩证法思想体系。它认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任何刚强的事物都蕴含着衰败乃至灭亡的契机,而处于柔弱、卑下的一方则往往拥有真正的强大的力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老子不但认识到矛盾转化的规律,而且认识到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矛盾双方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之中,总有一方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老子看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总是处于柔弱、卑下的一方,因而主张贵柔、守雌,以退为进,并由此而建立起自己的“柔弱胜刚强”的刚柔论思想体

系。范蠡则充分注意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事物转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在这里范蠡不再像老子那样将事物的转化看成是必然的过程，而是十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要积极创造条件，使事物向着有利于己的方面转化。这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春秋末期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进步，对于《孙子》一书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孙子正是用朴素辩证思维来思考军事问题的。《孙子》十三篇，充满了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其中，如“杂于利害”、“以迂为直”、虚实转化、“奇正相生”、常变结合等命题，都反映出孙子对辩证思维的体悟是何等深刻。

二、穿破迷雾见青天

——关于孙子其人其书

《孙子》是中国传统兵学理论的一座丰碑，对此，世人殊无异议。但关于该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等，则长期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记述孙子其人其书的最早的权威资料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其中写道：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

这里司马迁明确了三点：历史上确有孙武其人；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出仕于吴；孙武所著兵法为“十三篇”，这恰与今本《孙子》篇目相同。

对于《史记》的这一记载,从两汉至于隋唐千余年间并无异议。至宋代时,学术界刮起了一股疑古之风,一些人开始对孙子其人其书产生了怀疑,并由此揭开了关于《孙子》一书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大争论的序幕。

首启对孙武著作权怀疑之端的,是北宋的梅尧臣。他认为《孙子》并非孙武亲著,而是“战国相倾之说”(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三《孙子后序》)。南宋叶适继其后,以孙武“左氏无传”(即《左传》没有关于孙武的记载)为由,断言“凡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指,非事实”(《习学记言》卷四十六《孙子》)。陈振孙也随声响应:“孙武事吴阖庐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二)

对于宋人的质疑,明代似乎罕见有人附从,而清代以后附和者则不乏其人。全祖望认为:“水心(即叶适)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者,可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鮚埼亭集·孙武子论》)就连考伪专家姚际恒也不无怀疑地说:“然则孙武者,其有耶?其无耶?……其书自为耶?抑其后之徒为之耶?皆不可得而知也。”近人金德建断言“所谓孙武,全为伪托之说”^①,进而认定《孙子》一书为孙臧所著。日本学者斋藤拙堂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孙武与孙臧,毕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臧是其绰号。”(江侠庵:《先秦经籍考·孙子辨》引录)

以上我们列举了怀疑论者的一些主要观点。那么,关于《孙子》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争论呢?关键的问题是史料缺乏。司马迁为孙子立传时已有此感,因此才会将“吴宫教战”之类的传说写进去,而对于孙子在吴国的活动和贡献,则仅仅以“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等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怀疑孙武实无其人者,主要的论据是:如果孙武实有其人且当过吴国的将军,《左传》就应该有关于他的记载。其实这只是一种

^① “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臧考”,《古籍丛考》,中华书局1941年版